

專題研究

各版大藏經雕版簡史

智 銘

(續完)

南藏全藏一部用紙，共十一萬〇五百二十六張。請經條例規定，因其用紙之紙質及裝幀法之不同，共分九等價格：上等用紙爲連四紙、中等爲公單紙、下等爲扛連紙，裝幀法分第一號至第三號，每一號又分三級。上等第一號用最優質連四紙，上下表紙和經帙，全用緞子裱裝，一藏價銀爲二百八十九兩八錢八分二厘，下等第三號用扛連紙，上下表紙爲紙製，帙則以絹裱裝，一藏之價銀爲六十四兩六錢五分二厘，請經者以三個月爲限期，即可交付。每年可應二十藏和四大部經——般若、寶積、華嚴、涅槃二十部之請購。請經者留住之實際費用另計，並徵收板頭錢十二兩，用作萬曆續藏四十一函之追雕費用。

南京禮部所屬祠部請吏司所管理之南藏，依請經條例進行印經活動，直至清初仍在繼續。後來，松影承覺浪和尚之命，開始重修補刻，另建修藏場所，經營十年，成果甚著。此時，錢謙益曾繕有「大報恩寺修補南藏法寶募緣疏」，幫助修藏工作，但因經費不足，過份節減，所出之藏經多爲粗糙廉價本，使用不便。不久即有方冊本之出現。

十一、北京勅版大藏經

北京勅版大藏經又名大明北藏，明成祖於永樂元年（西一四〇三）二月，遷都北京，勅命出版大藏經，據永樂八年三月九日

大明太宗文皇帝御製藏經讚內，述明爲報答皇考皇妣宏恩，下詔將藏經付梓印施，永樂九年潤十二月之御製藏經跋尾，亦有此註記，由此可知大明北藏雕造之緣起。但真正着手，是在永樂十七年之三月三日，道成、一如等八人，奉旨在西紅門校勘大藏經，每一面定爲五行十七字之折帖本，以統一自宋以來南北各藏之裝幀法，使成一定之形式。

永樂十七年四月起，動員臣、僧一百二十人校合，僧人子謨等六十四人書寫板木，其他人等則整理經律論，編撰入藏目錄，並效唐太宗、宋太宗之例，御賜三藏聖教序，永樂十八年三月，御製序十三篇和佛菩薩讚跋十二篇，均被置於各經之首末。自永樂十八年庚子（西一四二〇）至正統五年庚申（西一四四〇），共費十八年時間，自大乘般若經至大明三藏法數，共六百三十七函，六千三百六十一卷，全部雕造完成。

大明北藏與大明南藏雖同爲十冊成一帙之折帖形式，但北藏第一冊之卷首，附有英宗正統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之御製大藏經序和御製讚牌和佛陀說法變相屏畫一紙。又每帙末冊卷尾，印有護法神韋馱天之立像一尊，南藏屏畫具有各種說法場面之變相圖。北藏之屏畫構圖則一，不過，近刻之屏畫越爲精巧。在每冊首末千字文編定之番號，雖仍承襲南藏，但天地則刻有粗細兩條母子線，是北藏之特色，清龍藏亦承襲此一特色。

大明北藏之經板，是由中央司禮監所管理，保存在禁內之祝崇寺漢經廠內。其對面則爲收藏明版西藏文大藏經板木之蕃經廠

。南北兩藏同是奉旨雕造，同屬大明皇朝之佛教文化事業，但南藏早已允准一般民間寺院請經印造。而北藏經板因藏於禁內。當有更大之權威，下賜不容易，請經更不容易，若某一寺院一旦獲賜勒版大藏經，該寺就得立刻建築藏經樓，奉納大藏經，並豎立賜藏碑文，引爲無上光榮。

萬曆十二年（西一五八四）十一月二十日，依神宗御製新刊續入藏經序，由華嚴懇談會記至第一希有大功德經止，共爲四十一函計四百卷，乃大明北藏之續藏經。此爲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之發願而追雕者。乃又添御製聖母印施佛藏經序，以及聖母印施佛藏經讚，下賜名山巨剎。獲賜之寺院，亦立刻獲勒續入藏經之石碑。如此，大明北藏已成爲六百七十八函，六千七百七十二卷之龐大藏經了。內容可見「大明三藏聖教目錄」四卷和「大明續入藏目錄」一卷。

十二、北京西藏文之大藏經

明成祖遷都北京後，除勅命出版漢文大藏經外，同時也勅命出版西藏文大藏經。西藏文大藏經是以西藏那爾丹古版爲底本而雕造者，後稱永樂版。神宗時，因該版使用百餘年，板面磨損，乃下旨重刊，並添加續藏四十二帙，後世稱爲萬曆版，此藏經板被收藏在禁內祝崇寺之蕃經廠內。

明亡以後，清聖祖康熙皇帝，於二十二年（一六八四），將明版再版。高宗乾隆皇帝，於乾隆二年增補，此明、清時代之西藏文大藏經，僅有經、律之甘珠爾而已，至清世宗雍正皇帝時，于雍正二年（西一七二四），曾刊行論疏類之丹珠爾。至此，甘、丹兩藏乃行完備。如來大藏經目錄，即甘珠爾目錄。

十三、萬曆版方冊本大藏經

袁了凡居士在雲谷法會參禪之時，遇該法會侍者幻余法本法師，言談中謂：明之南藏使用日久，請經者日多，版面大多磨損，經文不甚清楚，而北藏經板又藏於禁內，請經不易。如將古來之梵筴式折帖本改爲方冊本，不但節省經費而且使用方便，對法

寶之普及流傳，當有莫大裨益。當時，贊成此一提議者有密藏道開和陸光祖、馮崇禎二位居士。五台居士陸光祖於萬曆十二年（西一五八四）元旦，撰就「募刻書冊大藏經緣起疏」。萬曆十四年秋，紫柏大師達觀真可和密藏道開，偕同往訪憨山大師德清，當即獲得其支持，計劃由義學沙門及陸光祖居士等担任校對經文，經費預定三十萬兩，於十年內完成。

爲使此一計劃之早日實現，法本和道開二師於萬曆十一、二、三年就在江南之三吳兩浙間，掛錫勸募善資。萬曆十三、四年，二人隨達觀法師進入山西清涼山，準備開雕出版工作，至萬曆十七年時，在山西文殊菩薩化現聖地——五台清涼山妙德庵開版方冊藏。

然而，華北五台山，地處偏僻，氣候寒冷，資財運送，事務之進展交涉，均感困難。不得已，於萬曆二十一年，移至江南杭州徑山之興聖萬壽禪寺寂照庵內，繼續雕造。至萬曆四十年，又因山霧過濃，乃又遷東麓下院、化城接待院，甚至分散到江南各適當地方開版，版式爲四週有雙邊，行間有界線，行格每行二十字，以每面十行之明朝體文字雕刻。其折線處，上部印有「印度三藏」或「支那撰述」等字樣。在版心中部刻有經名、卷數、丁數，其下則刻有千字文和冊數。

此藏因在明萬曆年間發端雕造，故後人名之爲「萬曆藏」，但明朝滅亡清朝興起，至康熙五年，仍在開版續藏九十三帙，一千八百三十三卷。繼之，又加續藏四十七帙，一千二百四十六卷。至康熙十五年（西一六七六）二月，全藏一千六百八十八部，七千三百三十四卷之龐大方冊大藏經，方大功告成，前後歷時九十二年，較預定十年完成之時間，超出八十二年之多。

此版大藏經，以一寸厚之梨木雙面雕造，以四紙八頁方式印刷，以明之勅版北藏爲底本，以宋、元二藏及明之南藏爲校對本。在卷末將校對者、書梓者及檀越之姓名於每卷音釋之後刊記，雕好之板木，統存寂照庵保管並進行印刷活動。印好之經典運至嘉興楞嚴寺經坊，裝訂成方冊本，向天下發售。楞嚴寺應各方需要，曾發行「劃一目錄」和「刻經緣起」。故此藏又被稱爲嘉興藏或楞嚴寺版。

十四、清勅版龍藏

清朝勅版漢文大藏經即是龍藏，雍正十三年（西一七三五）二月一日，御製重刊藏經序內有云：「明之永樂年間于京師刊行之梵策本北藏經，尙未經精密之校訂，不足爲據。」因之，乃在北京東安門外之賢良寺予以嚴正校閱後，下旨重刊。其四月八日御製讚頌已撰成。

清朝爲出版龍藏，特設藏經館，莊親王允祿、和親王弘晝二人總理全部事務。在三名校閱官和九名監督之下，設筆帖、執事等六十四人爲事務官。賢良寺住持超盛以下高僧四人爲總率，僧超鼎等三人担任御製語錄事務。僧源滿等四人綜理校閱大藏經事務。實際校閱藏經者爲僧祖安、眞乾等二十四人分別從事各經論之校閱。至高宗乾隆皇帝三年（西一七三八）十二月二十五日，勅版重刊之大事乃行告成。先後不過三年時間。

在此藏開版途中，于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將華嚴會本懸談以下四部編入大藏經，乾隆元年正月十一日，欽定法華玄義釋籤以下五十四部一千一百二十七卷亦入藏，此等章疏，依其年代順序排入千字文番號予以雕造。

根據「大清三藏聖教目錄」五卷，雕造全藏七百三十七函，七千八百三十八卷，在「大清重刻龍藏彙記」內云：目錄經論題下註記有板木數和用紙數，由「天」字號起至「機」字號止，七百二十四帙之板木，有七萬九千零三十六枚。合計表裏之刻字面，有十五萬四千二百一十一連。尙不含裝飾卷首之佛像，龍牌及卷末護法神掌馱天像之板木在內。

北宋在益州（成都）雕造勅版時，其板木有十三萬餘枚，龍藏所收之經論內容增加甚多，但板木之數量反而較少，此乃因北宋勅版係單面雕造，而龍藏爲雙面雕造，故板數因而減少。龍藏版式在天地兩端均有母子線，每行十七字，每面二十五行，爲五行折帖，于中央空間處，以細字刻記千字文、帖數和紙數。其裝幀；在每字函第一帖卷首，附有佛說法變相一紙，和雍正十三年四月初八日御製龍牌一面，帙之末帖卷尾，添有護法神韋馱天立像

一面，每字函約十帖。爲經帙包裹形式，全仿明北藏之裝幀法。

十五、滿州語大藏經

清朝在未入關以前，對佛教之信仰已很深厚。但當時之滿州人，有滿州語，却未具有滿州文。至太宗天聰六年（西一六三二）之時，滿州學者達海，製造滿州文字。至世宗雍正帝時，擬將佛典譯爲滿州語文。至高宗乾隆皇帝，勅命調查西藏經典，二十三年（西一七五七）製成蕃藏目錄。二十四年，編纂漢、滿、蒙、蕃四譯對照之大藏全咒。其後，高宗爲紀念六旬大壽，計劃將漢文大藏經譯成滿州語。自乾隆三十八年（西一七七三）起，經過十八年時間，至五十五年時，大事告成，此部滿州語大藏經，會由清室寶藏在熱河之喇嘛廟普陀洛山經藏中。現很可能被日人密藏。

乙、結語

中國雕版大藏經，包含漢文、藏文、西夏文、滿文四種，共十五個版次。其中除了金刻、磧砂、崇寧、開元、恩溪、方冊等六版爲民間募資雕造者外，其他大多由中央政府撥款並勅命官吏主持雕造。由於這些雕版大藏的刊行，使法寶能普遍流傳，使一般人均能得而誦覽，這對佛法的宏揚固然影响很大，而對中國文學、哲學之影响也很深。

自進入民國以來，先是由於五四運動，一般青年在「新文學」運動領導者的「拆毀泥菩薩」的煽惑下，毀廟、毀佛、毀法、逐僧。繼之，又在「廟產興學」運動中，剩餘的佛教寺廟，大多被佔爲學校，佛教在如此的摧殘動亂之中，原有法寶的保護尙感力不從心，要想雕造刊行如此龐大的大藏經，簡直爲不可能。其中雖有類伽藏的刊行，但與前朝各大藏相較，不可同日而語矣。民國四十五年，屈映光居士發起在台影印「中華大藏經」，這部大藏經在內容上或較前朝各大藏爲多，但其僅是影印，以目前科技之進步，印刷術之精良，與前朝艱困情形相比，亦不可同日而語。我們在今日佛法衰微之時，研究前賢偉業，能促使吾人見賢思齊而努力于佛法之宏揚，續佛慧命，使永垂不朽。